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 著

李静 译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辜鸿铭——著 李静——译

中国人的 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by Gu Hongm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精神 / 辜鸿铭著 ; 李静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01-10774-5

I. ①中… II. ①辜… ②李… III. ①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7010号

中国人的精神

ZHONGGUOREN DE JINGSHEN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沛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产品经理 王胥
责任编辑 温欣欣
装帧设计 沈璜斌

制版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7.5
印 数 1-9,000
插 页 2
字 数 1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CONTENTS

目录

001	序言
017	导论 良民宗教
029	中国人的精神
093	中国的女性
121	中国的语言
133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143	大汉学家
153	汉学（一）
165	汉学（二）
175	暴民崇拜教或战争与出路
195	附录： 《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稿（节选）

序言

Preface

本书旨在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展现中国文明的价值。归根究底，一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已经建成或能够建成多么宏伟的城市、多么华美的房屋、多么平坦的道路；也不在于它已经打造或能够打造多么精致舒适的家具，多么巧妙实用的仪器、工具和设备；甚至不在于它确立了怎样的制度、发展了怎样的艺术与科学。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终要问的是：它能塑造怎样的人，怎样的男人和女人。只有一个文明所塑造的男女大众，才能真正体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就是这个文明的灵魂。而这些男男女女所讲的语言，又正体现他们的本质和个性，或曰灵魂。那句点明文学本质的法国谚语，“风格即人”，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因此，我将本书前三篇文章的主题分别定为：中国人、中国的女性、中国的语言，希望能以此阐释中国人的精神，展现中国文明的价值。

除此之外，我又加进了两篇文章，旨在说明，那些被视为“汉学家”的外国人事实上曲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也将力争揭示这些曲解产生的原因。我在文中阐释道，《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作者亚瑟·史密斯牧师，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身为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被公认为大汉学家的翟理斯博士也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身为英国人，他不够博大，缺乏有哲理深度的洞察力，以及由此而生的博大胸怀。我本打算再收录一篇从前写的书评，可惜找不到了。那篇文章所评价的，是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的、关于著名的慈禧太后的那本书，大约四年前，它被刊登在上海的《国族评论》上。我在文中试图阐明，像濮兰德与白克好司这样的学者，既不了解，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女性，尤其是中国文明塑造出的女性的最高典范——已故的慈禧太后。因为，像他们那样的学者都不够淳朴——他们都聪明过头，跟所有现代人一样善于歪曲事实。要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一个人必须兼具深沉、博大和淳朴的品质，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正是：深沉、博大、淳朴。

恕我直言，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很难理解真

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美国人通常博大、淳朴，却不深沉；英国人通常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通常深沉、博大，却不淳朴。而法国人呢，在我看来，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而且他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也的确最为透彻。¹当然了，法国人既缺乏德国人天性中的深沉，又缺乏美国人的广博和英国人的淳朴，但他们具备另一种非凡的心灵特质——灵敏，这是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首要条件，而其他三个民族普遍缺乏这一特质。因此，要概括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点，除深沉、博大、淳朴以外，还必须加上灵敏。这一灵敏，它的境界是如此之高，恐怕只有在古希腊人和古希腊文明中能看到，此外概莫能寻。

因之，学习中国文明，能使美国人变得深沉，使英国人变得博大，使德国人变得淳朴。而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都将获得一种精神特质——灵敏。恕我直言，上述民

¹ 用欧洲语言写成的关于中国文明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是前法国驻华领事西蒙所著的《中国城市》。剑桥的迪金逊教授亲口告诉我，他正是从那本书中获得灵感，从而写出了著名的《约翰中国佬信札》。——原注

族普遍缺乏较高境界的灵敏。法国人如果学习中国文明，不仅能变得深沉、博大和淳朴，还能使他们业已具备的灵敏更增一分。我坚信，学习中国文明，学习中国的文学经典，能造福所有的民族。因此，我在书中增加了一篇关于汉学的文章，针对如何学习汉学列了一个大纲。这个大纲，是三十年前我从欧洲回国，并决心开始学习本国文明时为自己所制订的，但愿能对想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人们有所助益。

最后，我还增补了一篇讨论现实政治的文章——《战争与出路》。我深知，涉足现实政治的领域是危险的，但还是决定这样做，目的正是展示中国文明的价值。我要证明，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典，绝不仅是只属于汉学家的爱好，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拯救欧洲文明于水火之中。

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阐明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因为除非人们找到这一根源，并清除它，否则形势将无可救药。我力图证明，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加德国的强权崇拜。我对前者费了更多的笔墨，因为客

观地看，正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事实上，正是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催生了如今引起公愤、庞大邪恶的德国军国主义。

首先，我想说，正是德国人的那种道德秉性，那种对正义的挚爱，以及由此而生的、程度相当的对不义的强烈憎恨，和对一切分裂和混乱的强烈憎恨，使德国人迷信并且崇拜强权。因为但凡是热爱正义、憎恨不义的人，都倾向于迷信强权，苏格兰的卡莱尔就是一个例子，他也有着德国式的道德秉性，强烈地憎恨不义。可是，为什么说英国的暴民崇拜要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呢？这也正是由德国人的道德秉性决定的。德国人痛恨分裂与混乱，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当他们目睹英国的暴民和崇拜暴民的政客们挑起非洲的布尔战争时，出于那种本能的对不义的强烈厌恶，他们甘愿作出巨大的牺牲，集体节衣缩食，来打造一支海军，目的就是铲除英国的暴民、暴民崇拜和暴民崇拜者。可以说，当德国人发现，自己在整个欧洲处于英国怂恿的邪恶暴民的四面包围之中时，他们愈发相信强权了，愈发迷信只有强权崇拜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这种出于对英国暴民崇拜的憎

恨而产生的强权崇拜，最终制造出了残暴可怕的德国军国主义。

我重申一遍，正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民崇拜，必须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正是它，导致了眼下的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的残暴和凶恶。所以，如果英国人民和所有的欧美人民想要铲除德国军国主义的话，那么他们首先应该打倒的，是自己国内的暴民和暴民崇拜者。对欧美国家乃至中国和日本那些正渴慕、呼吁自由的人，我在此冒昧说一句，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每个人都自觉遵规守矩，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之前的中国吧，比起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那时的中国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从不受教士、警察、市政税和所得税的困扰。为什么？因为在革命之前，中国人都遵规守矩，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做一个良民。而革命以后，自由在中国变少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有了剪掉辫子的时髦之徒、那些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从上海的欧洲暴民那里学会了不守规矩，学会了做暴民而非良民；他们还得不到驻于北京的英国外交官及海关总税务司的包庇纵容与扶

持。¹我的观点是：如果欧洲人、英国人，希望打倒德国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就必须先根除自己的暴民崇拜，约束本国的暴民，使之就范。

但是，尽管我说的是英国人的暴民崇拜以及对暴民崇拜的纵容，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及军国主义，我必须公正地说，这场大战的直接责任不在旁人，正在于德国人。

为了让诸位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在宗教改革引发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德国人以其热爱正义、憎恨混乱与分裂的道德秉性，握起军国主义之剑，成为了欧洲正统文明的捍卫者。换句话说，德国人承担起了恢复欧洲正统秩序的责任，取得了欧洲的道德霸权。宗教改革后，腓特烈大帝效仿英格兰的克伦威尔，挥起德国军国主义之剑，志在恢复整个欧洲，至少恢复了北部欧洲的秩序和统一。但看看他死后的

1 为了证明归国的中国留学生已变成怎样的暴民，我在此讲一件事情：去年，一些学生在北京给《京报》写信，明确威胁要针对我在《中国的女性》一文中批评新派中国女性的观点组织一场围攻。而上述粗暴行为的煽动者、《京报》创办人、聪明的中国“绅士”陈友仁先生，现在正是由英国外交部与海关总税务司资助的英中友好协会的资深委员。——原注

情形吧，他的后继者完全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把利剑来捍卫文明，根本不配掌有欧洲的道德霸权。结果，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德国本土，都变成了丑恶深驻的无底深渊，只在表面留了一层虚饰的文明，以至于深受苦难的大众——法国的普通男女们，挥起了长矛，发动起义来反抗压迫。然而这些反抗压迫的法国人很快就沦为了暴民，并最终找到了一个伟大而又能干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在他的率领下，暴民们一路烧杀抢掠，洗劫了整个欧洲，直到各国终于在军国主义德国的身边联合起来，才于滑铁卢一役打败这位暴民的伟大领袖，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至此，欧洲的道德霸权本应归还给德国人，交给德国人的脊梁——普鲁士人，然而，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却心怀嫉恨，他们阻止了这一切。结果，暴民们逃过了德国军国主义之剑的制裁，于1848年再度发起猛烈的暴动，险些摧毁欧洲文明。这一次，又是作为德国核心的普鲁士人，在其道德秉性的驱使下，挥舞起军国主义之剑，保住了君主政体（俾斯麦称之为王朝），将欧洲从暴民手中解救了出来。

然而奥地利人——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又一次心怀妒意，他们绝不允许普鲁士人接手欧洲的道德

霸权，直到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和毛奇，对他们诉诸武力，才夺回了它。之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上了法国皇帝，他唆使巴黎的暴民追随自己，去同德国人争夺霸权。尽管他的叔父是个伟大的暴民领袖，但这位拿破仑却只是一个骗子，用爱默生的话说，只是个成功的小偷。结果，威廉大帝挥起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利剑，在色当教训了这位可怜又成功的小偷。法国的普通民众信任暴民和骗子，最后却发现，洗劫和烧毁他们房屋的，不是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者，而恰恰是他们信任的暴民。从1872年起，德国人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实际政治上取得了欧洲的霸权，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日耳曼人的道德秉性，手中紧握军国主义的利剑，因而从1872年开始，欧洲得以享受了四十三年的和平。所以，咒骂德国军国主义，咒骂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应该扪心自问，欧洲曾经是多么有幸能够拥有这种军国主义。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叙述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就是想让德国人明白，我说这次大战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绝非出于成见。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只因，权力就意味着责任。

我曾说，是德国人对正义的强烈热爱，对分裂和混乱的极端憎恨，使他们迷信和崇拜强权。现在我要说，当这种热爱和憎恨愈演愈烈，并最终超出极限时，其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不义，而且比分裂和混乱更加可怕、更加邪恶。古希伯来民族就是前车之鉴。他们曾给欧洲带来知识与爱，但也因对正义的过度热爱而产生了对不义的憎恨。这种强烈、狭隘、僵化的恨意，不断升级泛滥，最终导致了犹太王国的覆灭。耶稣基督，那位被马修·阿诺德形容为拥有无法言喻的柔和与理性的救世主，为了将他的子民从恨意中拯救出来，对他们说：“效仿我的柔和与从容，你们的灵魂方得宁静。”然而，他自己的子民不肯听从他，反而将他钉上了十字架，最终亡了国。基督也告诫当时欧洲文明的保护者罗马人说：“拔剑者必亡于剑！”然而罗马人对此不仅置若罔闻，还允许犹太人迫害基督，结果罗马帝国崩溃了，欧洲古代文明也随之覆灭。难怪乎，歌德说：“人类要经历多少曲折，才能懂得宽恕罪者，善待犯人，以人性对待非人性？最先这样教导、践行、推动众人践行，甚至不惜为之献身的人，是真正具有神性的圣者。”

在此，我谨借用德国的伟人歌德的话向德国人呼吁：

除非他们摈弃那种过分强烈、狭隘、僵化的恨意，除非他们摈弃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否则德意志民族会像犹太民族一样灭亡。不仅如此，欧洲文明也会因失去了强力的捍卫者，而像欧洲古代文明一样崩溃、衰亡。我认为，正是这种过分强烈的恨意，导致德国人迷信强权；而又是这种对强权的迷信，导致德国的外交官、政府和民众，在对待其他民族时态度蛮横、轻率无礼。

如果有德国朋友叫我拿出证据，我只需将北京的克林德牌坊指给他们看，那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¹正因为德国人的这种强权崇拜，因为德国外交的蛮横无礼，连俄国沙皇都说：“我们已经忍了七年，是时候做个了结了。”正是德国外交的蛮横无礼，使得热爱和平的俄国沙皇，使得全欧最优秀、健壮、可爱、善良和仁慈的俄国人，选择与英法的暴民和暴民崇拜者站在同一战壕，组成“协约国”，

1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狂热的团民意外杀害，为了惩罚这种暴民行为，德国外交官坚持要求在中国首都最主要的大街上竖起这座克林德纪念牌坊，以这种在他人额头上留下无法消除的污点的方式，羞辱整个中华民族。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俄国驻华公使、已故的喀西尼伯爵，在与一位美国报界人士的会谈中说道：“中国人有礼有节，而英德两国公使，尤其是德国的驻华公使，却出奇地无礼！”——原注

甚至让俄国人站在塞尔维亚的无政府主义暴民一边，引爆了这场战争。一言以蔽之，德国外交和德意志民族的蛮横轻率，要对这场战争负直接的责任。

如果，作为欧洲现代文明捍卫者的德意志民族不想覆灭，并想拯救欧洲现代文明，就必须摈弃那种狭隘、僵化、扭曲的恨意，摈弃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又该到哪里去找出路呢？我认为，伟大的歌德对此早有教诲，他曾说：“世上唯有两种和平的力量：义与礼。”而义与礼，正是孔子为中国人确立的良民宗教的核心；尤其是礼，堪称中国文明的精髓。希伯来文明曾教授欧洲人以义，却没教授礼；希腊文明曾教授欧洲人以礼，而未教授义。只有中国文明的良民宗教，是义礼并重的。欧洲人依据希伯来《圣经》中对文明的设想，建立了如今的现代文明。这部《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品格正直、行为端正。而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即孔子为中华民族保存的文明大纲，不仅也这样教导中国人，还补充了一条：要识礼。换句话说，欧洲的宗教教导：“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教导：“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教诲说：“爱人类。”而孔子教诲说：“爱之